

民粹主义浪潮下中东欧国家俄裔的身份分析

——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为例*

彭 泉

内容提要 由于历史恩怨与现实威胁,俄罗斯少数族裔自中东欧转型以来就是一些国家建立独立民族认同的障碍,乌克兰危机后更是被视为潜在分裂国家的“特洛伊木马”。自难民危机以来,俄罗斯通过积极施展“政治捕获”这一隐性的外交手段,在保守主义繁荣的中东欧邻国弱化了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对俄裔的排斥与攻击。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手段在俄裔身份地位提升中的作用。这一针对他国内部的“政治捕获”包括笼络右翼民粹政党、培植中左翼主流亲俄政党,以及影响选民偏好等三个策略。通过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与俄裔民族矛盾较为严重国家的比较分析,上述三个策略得到验证,两国当前势头最盛的民粹政党对俄裔的排斥均较之前有明显下降。而所在国选民主要的议题需求和政党政治系统的差异性俄罗斯选择运用何种具体策略的决定性因素。在民粹浪潮下的中东欧,通过多种政治捕获策略化解俄裔遭受民族排斥的事实性难题,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民粹主义 民粹政党 中东欧 俄裔 俄罗斯

由于战乱迁徙、政治变迁、天灾动荡等原因,流散族裔(disapora)具有故土难离的特征,对祖国始终保有感情,自认为难以被客居国完全接纳。^①他们在生理和文化上与主体民族存在差异,时常遭到不公对待与集体歧视。^②俄罗斯少数族裔(下文统称“俄裔”)是流散族裔的重要群体。俄裔在乌克兰、爱沙尼亚等中东欧邻国一直受到公民权利、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歧视,例如打压俄裔政党或团体、限制俄裔的投票权、要求俄裔使用主体民族语言等,这些排斥现象使俄裔生活在紧张的民族隔阂中。东欧剧变后,俄裔在邻国备受排挤,曾地位优越的俄裔既反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又无法回到俄罗斯,成为引发俄罗斯与邻国政治矛盾的主要原因。^③随着中东欧彻底西方化,象征旧时“被殖民”历史的俄裔成为本土主体民族的靶子。民族主义者要求将俄裔赶回老家,消除苏联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对中国—中东欧合作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1EGJ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关于“diaspora”这一概念,国内对此术语的翻译不尽相同,如散居族群、离散族裔等,这一群体的“来源国”与“所在国”也有不同表述方式,如故国、母国、祖国、祖源国,以及移居国、宿主国等。本文为行文方便,采用流散族裔、祖国与客居国进行表述。参见:周雷、牛忠光:《国际移民视域下的“Diaspora”话语:概念反思与译介困境》,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第73—81页;朱桦:《离散研究的学术图谱与理论危机》,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

② Louis Wirth, “The Problem of Minority Groups”, in: R. Linton (ed.),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World of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347.

③ Uma A. Segal, Doreen Elliott, Nazneen S. Mayadas, *Immigration Worldwide: Policies, Practices, and Trends: Policies, Practices, and Tren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7.

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领域的影响,谓之“去殖民化”。^①近年来,克里米亚危机中占主体的俄裔主导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进程,俄裔被中东欧多国视为俄罗斯干扰客居国政治的“特洛伊木马”,在邻国受歧视的情况又出现一波新高潮。^②其中,由于政治差异更大、历史积怨更多、现实矛盾更集中,俄裔在中东欧邻国的生存比中亚等其他地区的邻国更艰难,也更为值得关注。

一、俄裔身份受到中东欧国家排斥的原因分析

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根据“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提出涉及流散族裔议题的三个主体,即少数族裔、少数族裔生活的新民族国家、少数族裔文化上归属的祖籍国。^③从该理论框架的三个方面看,苏联解体后,广布于俄罗斯邻国之中的俄裔都存在被邻国主体民族排挤与歧视的条件。此外,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因素也不容忽视,即保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政治在中东欧地区的兴起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研究指出,当少数族裔客居的国家有更高的自由价值属性,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就越大;而在一个民粹盛行、保守主义占上风的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排斥现象会更多。^④四个因素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 少数族裔因素:俄裔的地位出现落差

俄裔人口约两千万至三千万人,多聚居于苏联、中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既包括沙俄时期因战争、宗教传播等原因外迁的,更多的则是苏联时期为服务于“帝国”而外迁的,多为散居于邻国的城市工人、技术人员等,是所在国地位较高与收入较多的群体,这使得俄裔本身就有文化上的和地位上的优越感。而剧变后地位上的巨大落差使俄裔产生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倾向于通过塑造强大的俄罗斯民族认同来弥补心理落差,甚至变为拒绝融合于邻国社会体系的“文化旅居者(sojourner)”。^⑤因而遭到邻国社会的边缘化,成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二) 客居国因素:主体民族将俄裔视为异类

俄罗斯的邻国——尤其是中东欧本就是民族熔炉,加之各国剧变后政治权力的不稳定,历史上民族和领土的完整性屡遭霸权破坏,使各国领土纠纷、民族矛盾特别严重。^⑥领地意识与对历史遗产的不甘,使这些相邻国家或民族之间关系不睦。凯姆里加(Will Kymlicka)指出,少数民族虽然在苏东转型后获得了部分权力,但始终被主体民族视为不忠,“领土复兴主义(irredentism)”是地区政治中的高频词汇。^⑦特别是在与俄罗斯存在民族矛盾、领土争议或曾经受到俄罗斯政治或文化压迫的国家,俄裔更遭受严重敌视。

(三) 祖籍国因素:俄罗斯与邻国关系持续紧张

苏东转型后,俄罗斯与中东欧部分邻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在乌克兰危机后更为恶化。俄罗斯频

① Piret Peiker, “Estonian Nationalism through the Postcolonial Lens”,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016, vol. 47, no. 1, pp. 113 – 132.

② Anthony Clive Bowyer, “Countering Russian Influence in Europe and Eurasia”, *IFES White Paper*,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 November 2019, p. 7.

③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

④ Yossi Shain, “Ethnic Diaspora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9, no. 5, Winter 1994 – 1995, pp. 811 – 841.

⑤ Paul C. P. Siu, “The Sojourn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2, vol. 58, no. 1, pp. 34 – 44.

⑥ Wolfgang Merkel, “Gegen alle Theorie? Die Konsolidierung der Demokratie in Ostmitteleuropa”, in: Klemens H. Schrenk, Markus Soldner (eds.), *Analyse Demokratischer Regierungssystem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pp. 545 – 562.

⑦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ism and Minority Rights: West and East”,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vol. 14, no. 4, 2015, pp. 4 – 25.

繁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贸易和能源手段,及军事与安全手段等对邻国施加干预,引发国家间的猜忌和对抗。^① 特别是俄裔,在俄罗斯外交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被视为干预他国内部政治的特殊手段。^② 并且当俄裔受到不公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诉诸祖籍国俄罗斯施压于邻国,以保障其象征性或合法性权益。^③ 此举更加重了主体民族的不满,从而在国内采取继续打压俄罗斯裔的种种行动。

(四) 社会背景因素:保守政治氛围令俄裔等少数族裔受到敌视

当前与俄罗斯紧邻的中东欧是欧洲保守政治最猖獗的地区,2000年中东欧的民粹政党只有9.2%的平均投票份额,2017年就上升到31.6%。^④ 煽动民族主义的右翼民粹政党推动本国及本族利益的最大化,排斥被认为有威胁或劣等的少数民族,引发社会冲突。^⑤ 有学者指出,2007年中东欧的自由进程实际上就已经终结了,新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将整个地区撕裂。^⑥ 由于转型后反共走向极化和民主共识薄弱,中东欧威权思想一直存在,批判多元主义,自由价值本就不足。^⑦ 反共、反俄更是普遍存在的思潮。

二、改善俄裔身份地位的“政治捕获”策略

近年来,一种基于国际关系视角的少数民族议题也变得越来越引人关注,如跨国压力的效应、邻国政权的介入、国家政治的变迁等都被纳入研究范畴。^⑧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国家与移民、流散族裔等跨国民族主义问题。作为推行保卫全球俄裔的“同胞政策(compatriot policy)”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试图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以改善族裔的生存状况。^⑨

(一) “政治捕获”是什么?

政治捕获(political capture)一词来自公共政策领域,指决策主体或关键政治实体受到隐性政治手段影响或操纵的行为,特别是利益团体影响决策者从而制定或改变公共政策,包括打通与决策者的个人关系、利益交换、言辞劝说,甚至贿赂等手段。^⑩ 影响行为本身就是要使他人同意你的观点或者做你让他们做的事情。^⑪ 一般来说,一国对他国的影响行为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影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他国的行动,如军事威慑或干预、“贸易战”、切断能源供给、阻碍人员交流等。另一种则是隐性手段,如培植亲己方的政党,为一些党派提供财力支持,通过舆论鼓动某些选民支

① F. Stephen Larrabee, Stephanie Pezard, Andrew Radin, Nathan Chandler, Keith Crane, Thomas S. Szayna, *Russia and the West After the Ukrainian Crisis*, RAND Corporation, RAND, 2017.

② 张严峻:《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俄罗斯世界”》,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Kjetil Duvoid, “Beyond Borders: The Return of Kin-State Politics in Europe”, *Baltic Worlds*, 2015, vol. 8 no. 1/2, pp. 19–32.

④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European Populism: Trends, Threats, and Future Prospects*, 2017.

⑤ José Filipe Pinto, “Populism, is it Democracy’s Bastard or Twin?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vol. 2, no. 3, pp. 328–344.

⑥ Ivan Krastev, “Is East-Central Europe Backsliding? The Strange Death of the Liberal Consensu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 vol. 18, no. 4, pp. 56–63.

⑦ Bart Bonikowski, “Ethno-nationalist Popu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Collective Resentmen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vol. 68, no. 1, pp. 181–213.

⑧ Peter Vermeersch, “EU Enlargement and Minority Rights Policies in Central Europe: Explaining Policy Shif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Journal on Ethnopolitics and Minority Issues in Europe*, 2003, vol. 14, no. 1, pp. 114–140.

⑨ Oleh Kozachuk,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Russian Speakers as a Challenge for Ukraine’s Ethnic Policy?”, *Ante Portas-Security Studies*, 2016, vol. 7, no. 2, pp. 361–380.

⑩ Jean-Jacques Laffont, Jean Tirole,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 Theory of Regulatory Capt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vol. 106, no. 4, pp. 1089–1127.

⑪ Gabriel Collins, “Russia’s Use of the ‘Energy Weapon’ in Europe”, Rice University’s 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2017, Issue Brief No. 07.18.17.

持它们;借助社交媒体笼络民意;通过“信息战”扰乱他国选举等。这些隐性影响行为就属于政治捕获形式。由于政治捕获对实现国家利益具有特殊作用,越来越成为外交中的重要手段。

朱晓中指出,俄罗斯就是采取政治捕获的老手,是其在中东欧邻国扩展影响的重要方式。^① 乌克兰危机以后,通过外交、舆论、社交媒体、宗教、非政府组织、经贸、能源,以及军事力量在内的多种方式,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在显著提升。^② 其中,煽动疑欧主义者和俄罗斯同情者、培植反建制派,俄罗斯的政治捕获收获颇丰。研究指出,俄罗斯影响力的扩张至少有三个结果:一是确保本国政权长久稳定;二是确保在地区的绝对权力;三是维护与世界强国地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③ 捍卫俄裔的利益,本身也是俄罗斯影响力扩张的一个目的。

(二) 如何判断“政治捕获”取得了效果?

由于政治黑箱的存在,政治捕获的效果不总是能够明显体现出来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一贯热衷于炒作民族矛盾的极端右翼民粹政党都弱化了对俄裔的攻击、减少了对俄裔的歧视,那么更不用说其他政党或团体。“排俄”的气氛将随着极右翼势力对涉俄裔议题的弱化而减弱,俄裔也将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

民族主义是右翼民粹政党乐于宣扬的理念,要求给予某个民族在一致性、自治性和认同性上的优先地位,是“内群”和“外群”间的尖锐划分。^④ 实证研究表明,相比于经济、腐败等因素,在解释民粹保守思潮为何兴盛的问题上,民族矛盾的解释力最强。^⑤ 这是由于文化上更显著的内群偏爱与外群敌意的社会认同机理(social identity),引发的冲突更为剧烈。^⑥ 虽然穆德(Cas Mudde)将民粹主义揶揄为“反动的部落主义(reactionary tribalism)”,但民间旺盛的民族主义需求和民粹政党的民族主义政策供给之间始终保持均衡。在当前弥漫于中东欧的排外情绪下,打文化与族群牌的民族主义是民粹政党乐于提供的策略形式。^⑦

从逻辑上推断,若极端右翼民粹政党弱化了针对俄裔的攻击,至少可以表明两点:一是在需求侧,民间主体民族排斥俄裔的需求出现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间主体民族受到俄罗斯的政治捕获;二是在供给侧,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放弃了排俄的民族主义议题,表明其直接或间接受到了俄罗斯的政治捕获,从而改变其政策或话语。^⑧ 无论如何,当右翼民粹政党减少了对俄裔的排斥,都意味着俄裔在所在国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显示出俄罗斯“政治捕获”取得了积极效果。故选择中东欧邻国主要的右翼民粹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排俄政策或话语为判断指标,在逻

① 朱晓中:《浅析近年来俄罗斯影响中东欧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6期。

② Péter Krekó, Lóránt Györi, Edit Zgut, *From Russia with Hate*, Political Capital, April, 2017.

③ Geir Hågen Karlsen, “Divide and Rule: Ten Lessons about Russian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Europe”,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vol. 5, no. 1, pp. 1–14.

④ John Breuilly, “Dating the Nation: How Old is an Old Nation?”, in: Atsuko Ichijo, Gordana Uzelac (eds.), *When is the Nation?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5–39.

⑤ Elisabeth Ivarsflaten, “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 Re-examining 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even Successful Ca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vol. 41, no. 1, pp. 3–23.

⑥ 简言之,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归属于群体,当个体遭遇威胁,一来会强化对所属内群体的依附感,二来会强化对外部威胁的敌意,即对外群体的排斥和厌恶,从而引发群体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短时间内难以化解,个体会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群体文化身份,抵制多样性。民族、宗教和语言等是群体划分的重要维度。参见:Bo Peterson, “Hot Conflict and Everyday Banality: Enemy Images, Scapegoats and Stereotypes”,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vol. 52, no. 4, pp. 460–465; Galen V. Bodenhausen, “Diversity in the Person, Diversity in the Group: Challenges of Identity Complexity for Soci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vol. 40, no. 1, pp. 1–16.

⑦ Jens Rydgren, *Class Politics and the Radical Right*,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2.

⑧ 关于民粹的供需研究,参见彭泉:《当代欧洲民粹政党的兴起:基于“供需机制”的解释》,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6期,第105—134页。

辑推断上是合理的。

(三) 俄罗斯对邻国“政治捕获”的具体手段

从历史上看,冷战结束后至 21 世纪初,俄罗斯倾向于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作为政治捕获的对象,特别是高层政治精英,以在北约、欧盟、经济等问题上创造空间。如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等政治强人都与俄罗斯及普京(Vladimir Putin)建立了友好关系。^① 2008 年格鲁吉亚战争后,面对周边的不利局面,俄罗斯转向对邻国施加隐性影响,在“新民主成员”内部培植政治势力,至少收获了五类“盟友”,极大拓展了战略空间。盟友包括政党与市民团体、学术机构、媒体、极端组织,以及商业利益伙伴。^② 学者指出,对于俄罗斯的跨国影响而言,他国的政府、政党等决策性主体和民间社会性主体的地位是同等的,且普遍重要于其他主体。^③ 对本文而言,这一判断突出了选举的价值。第一,选举是政府制定政策或政党输出立场的重要形式,是决定俄裔前途的重要因素,民粹政党、主流政党和公众是中东欧选举中的三个重要的实体。第二,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制衡机制,多类政党主体和选民之间存在复杂的结构性互动,复杂的互动为俄罗斯施加影响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遇。

因此,就对象而言,俄罗斯政治捕获的决策性对象为右翼民粹政党和竞争性的主流政党,俄罗斯政治捕获的社会性对象为所在国公众。结合本文对政治捕获效用的判断标准,俄罗斯直接捕获路径为影响右翼民粹政党;间接捕获路径为影响民粹政党的主流竞争对手及影响所在国选民。俄罗斯采取直接捕获与间接捕获的形式实现其利益。由于不同对象国的政党结构、选民需求等选举关键变量存在差异,俄罗斯在政治捕获实践中还会不断调整策略。

第一,直接笼络右翼民粹政党。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重视国家主权,强调保守的民族认同,尊重传统宗教道德和社会风俗,主张维持传统的家庭观念,对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极度狂热。基于反新自由主义与反欧盟的共同立场,俄罗斯与部分中东欧民粹—民族主义政党已结成紧密的利益纽带。首先,在价值层面。由于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多重危机,中东欧的右翼民粹政党对自由主义持严重批判的立场,“危机话术”使右翼民粹政党获得了广泛支持,这与俄罗斯主推的价值观有一定相似性。^④ 其次,在建制层面。穆德指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反而会激发疑欧主义与民粹主义。^⑤ 因为欧盟东扩带来了自由的人员流动,“去地方化”现象也越发严重,本地主体民族的认同受到挑战,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民粹政党在供给上的必然选择。^⑥ 这事实上又迎合了俄罗斯反东扩、反西方化的立场。2014 年以来,俄罗斯通过权钱交易为中东欧民粹政党提供财力支持。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等国的民粹政党都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援。^⑦ 甚至西欧的民粹政党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如“第一捷克—俄罗斯银行(First Czech Russian Bank)”就为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① Pavel Baev, “Russia in East Central Europe: Means of Pressure and Channels of Influence”, *IFRI*, June 2016.

② Geir Hågen Karlsen, “Divide and Rule: Ten Lessons About Russian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Europe”,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vol. 5, no. 1, pp. 1–14.

③ Geir Hågen Karlsen, “Tools of Russian Influence: 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in: Janne H. Matlary, Tormod Heier (eds.), *Ukraine and Beyond: Russia’s Strategic Security Challenge to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81–208.

④ Jacques Rupnik,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8, vol. 29, no. 3, pp. 24–38.

⑤ Cas Mudde, “EU Accession and a New Populist Center-Periphery Cleava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S Central & Eastern Europe Working Paper*, no. 62, 2004.

⑥ Ben Cahill, “Of Note: Institutions, Populism, and Immigration in Europe”, *SAIS Review*, 2007, vol. 27, no. 1, pp. 79–80.

⑦ Leonid Ragozin, “Putin’s Hand Grows Stronger as Right-Wing Parties Advance in Europe”, Bloomberg, 15 March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3-15/putin-s-hand-grows-stronger-as-right-wing-parties-advance-in-europe>

Front)”提供巨额竞选资金。^① 在中东欧多国由民粹政党执政的情况下,普京与欧尔班(Viktor Orbán)等民粹领导者建立了非凡的个人关系。^② 俄罗斯虽被西方制裁,但明确表达反对声音的正是来自这些中东欧的民粹伙伴,在国际舞台上也充分彰显了俄罗斯政治捕获的积极效果。

第二,培植主流亲俄政党。在中东欧主流政党中,有两类政党与俄罗斯或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保持良好关系。首先,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左翼政党。^③ 如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Smer-SD)”、保加利亚的社会党(BSP)、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党(PSD)等。统一俄罗斯党延续左翼传统,与中东欧国家的主要左翼政党签订党际合作协议,结成伙伴,甚至还包括意大利左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M5S)”。这说明俄罗斯在欧洲左翼政治中培植了广泛的支持力量。其次,由俄裔建立的少数民族政党。这类政党一般也为左翼型。如拉脱维亚的“和谐党(Harmony)”“俄罗斯人联盟(LKS)”等。亲俄派的主流左翼政党或俄裔政党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一方面说明俄裔在该国的生存状况较好,权利的代表性较为充分;另一方面也为俄罗斯提供政治机遇,借由左翼政党对客居国政治施加强大的影响。基于空间投票论(spatial voting theory),选民对选举是有其最佳位置和预期的,他们会衡量不同政党的政策位置,选择与自己最佳位置距离更近的那个。^④ 议题是否重要,是公众个体施加权重的问题,基于对每个竞选党派与每个议题间距离的感知而来。^⑤ 左翼政党在选举中拥有更大份额,能够表明民众对社会平等、司法公正、经济发展等中左议题更关切,民族主义议题的显著性较低。并且由于左翼政党的代表性更强势、充分,右翼民粹力量受到制衡,便难以煽动更大的排外。俄罗斯培植亲己的左翼力量,从而压制民族主义声势。

第三,影响中东欧的选民偏好。中东欧的民众虽有反俄情绪,但随着欧洲多危机降临,“反俄派”与“反西化派”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16年难民危机过后,捷克有30%的人主张亲西方,26%的人选择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差距并不大。在斯洛伐克,民众对欧盟的支持度从2010年的68%下降至2016年的52%。^⑥ 首先,现代化失败者理论(modernization losers thesis)指出,无力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底层人士成为现代社会的弃子,拥护保守主义。^⑦ 一方面,中东欧现代化转型始终是倾向于西方的知识精英推动的,普通民众很少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转型并没有出现令中东欧民众感到满意的结果,反而产生了腐败猖獗、司法不公等问题。加入欧盟后,成员国边界打开,越来越多的移民加剧了中东欧本土民众的不满,少数族群在工作机会、社会福利和文化认同上对当地人构成挑战。^⑧ 因此,遭遇各种危机的民众自然将不满情绪投射给本国精英和欧盟。其次,俄罗斯正是通过社交网络、市民团体、东正教会等形式引导中东欧公众——特别是主体民族公众,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煽动他们对欧盟的更大不满,以发动“信息战”为典型。^⑨ 通过宣传恐怖主义威胁、欧盟

① Ivo Oliveira, “National Front Seeks Russian Cash for Election Fight”, *Politico*, 19 February 2016,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le-pen-russia-crimea-putin-money-bank-national-front-seeks-russian-cash-for-election-fight/>

② “Big, Bad Visegrad”, *The Economist*, 28 January 2016,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6/01/28/big-bad-visegrad>

③ F. Stephen Larrabee, Stephanie Pezard, Andrew Radin, Nathan Chandler, Keith Crane, Thomas S. Szayna, “Russia and the West After the Ukrainian Crisis”, *Rand Corporation*, 2017, Chap. 5.

④ Wouter van der Brug, “Issue Ownership and Party Choice”, *Electoral Studies*, 2004, vol. 23, no. 2, pp. 209–233.

⑤ Robert A. Bernstein, “Directing Electoral Appeals away from the Center: Issue Positions and Issue Salien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1995, vol. 48, no. 3, pp. 479–505.

⑥ Milan Šuplata, Milan Nič, “Russia’s Information War in Central Europe: New Trends and Counter-Measures”, *Globsec Policy Institute*, 2016.

⑦ Jens Rydgren, “The Sociology of the Radical Righ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vol. 33, pp. 241–262.

⑧ Rogers Brubaker, “Why Populism?”, *Theory & Society*, 2017, vol. 46, no. 1, pp. 357–385.

⑨ Andrei P. Tsygankov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bingdon: Routledge, 2018; Mark Galeotti, “Controlling Chaos: How Russia Manages Its Political War in Europe”, Policy Brief,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2017.

和主流建制对难民危机的应对无能等,俄罗斯成功激起了中东欧民众的恐惧与愤怒,将民族主义矛头转向穆斯林等群体。俄罗斯还宣称北约将把核武器安置在波罗的海国家、传播北约士兵强奸立陶宛少女等信息,从而引发所在国民众的恐慌。这些操作不仅帮俄罗斯建立起了与极端政治伙伴的关系,如反移民、反北约和反欧盟的匈牙利“尤比克(Jobbik)”、保加利亚“攻击党(ATAKA)”,更是由于这种转移视线机制(diversionary mechanism)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俄裔赢得了宽松的生存环境。俄罗斯虽没有赢得邻国公众,但却将矛盾引向了欧盟、北约及其失败政策,制造了不信任以分化欧洲。

三、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排俄”的历史

在俄罗斯的中东欧邻国中,乌克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散居的俄裔最多,其中尤以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为首。^① 爱沙尼亚人口中的 24.8% 为俄裔,拉脱维亚的俄裔占 24.9%。并且两国的历史遭遇、面向西方的民主化转型进程也大体相似。^② 两国主体民族与俄少数族裔之间的界限分明,社会冲突较为激烈。^③ 右翼民粹显著地受到“身份政治”的影响。^④ 穆德指出,“波罗的海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家和民族建设之初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国界之内巨大数量的讲俄语人口,二是国境外敌对的俄国。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有自我意识的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本土政党和边缘与怀旧的俄罗斯裔(russophone)政党处于对峙状态,从而导致了政治极化”^⑤。

波罗的海俄裔问题是苏联解体导致的,由于边界突然变动,俄裔不得不“搁浅(beached)”^⑥。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与俄罗斯的恩怨颇深。独立后的“俄罗斯问题”作为苏联遗产的一部分,始终在两国的转型进程中扮演复杂角色。^⑦ 在“俄化(Russification)”历史与“波罗的化(Baltinisation)”现实的拉扯下,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均以“族群中心(ethnocentric)”来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为保持文化和族群的纯洁性与同一性而排斥俄裔,采取“族群控制式的政权(ethnic control regime)”^⑧。对主体民族而言,反俄裔是建立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头等大事。相对地,俄少数族裔的祖籍国认同得到激发,族群间的隔阂与冲突愈演愈烈。^⑨ 根据皮尤的数据,两国均有七成左右的俄裔对俄罗斯有更亲的感情,认为俄罗斯有义务保护他们;仅一成的俄裔对作为拉脱维亚人或爱沙尼亚人感到骄傲;主体民族中只有四成左右的人认可种族多元,多数人排斥俄

① Jennie Schulze, *Strategic Frames: Europe, Russia, and Minority Inclus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8.

② Aurelien Poissonnier, “The Baltics: Three Countries, One Economy?”, *European Commission*, April 2017,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eb024_en.pdf

③ Graham Smith, Vivien Law, Andrew Wilson, Annette Bohr, Edward Allworth, *Nation-building in the Post-Soviet Borderland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Stefano Braghiroli, Vassilis Petsinis, “Between Party-systems and Identity-politics: the Populist and Radical Right in Estonia and Latvia”,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9, vol. 20, no. 4, pp. 431 – 449.

⑤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3.

⑥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

⑦ T. Vihalemm, M. Lauristin, “Cultural Adjustment to the Changing Societal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Russians in Estonia”, in: M. Lauristin, Vihalemm (eds.), *Return to the Western Worl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stonia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6.

⑧ Vello Pettai, Klara Hallik,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Ethnic Control: Segmentation, Dependency and Cooptation in Post-Communist Eston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02, vol. 8, pp. 505 – 529.

⑨ Victor Roudometof, “From Greek-Orthodox Diaspora to Transnational Hellenism”, in: A. Gal, A. S. Leoussi, A. D. Smith (eds.), *The Call of the Homeland*,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0, p. 140.

裔。^① 布鲁贝克指出,这是“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不匹配的必然结果”^②政治边界是公民性的(civic),涉及领土、主权和个体的权利;文化边界虽为象征性的边界,但却是族群冲突的坚实基础,是民族(ethno)界定的。^③

(一) 政治边界上的公民身份

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支柱,也是少数族裔被接纳或被排斥的体现。第一,独立后由于惧怕俄裔在边界从事分裂活动,两国本土政党和保守政府都主推歧视性公民政策,特别是基于“血统原则”给予公民身份。只有先于苏联时期迁移而来的极少数俄裔才能得到公民身份,大部分俄裔及子女都无法获得公民权。两国还制定了严格的归化政策,俄裔重新申请公民身份的难度高。即便到乌克兰危机之前,拉脱维亚仍有14.25%的俄裔为“非公民”,爱沙尼亚为6.5%。“非公民”无法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在爱沙尼亚仅能参与地方选举,在拉脱维亚根本无法参与任何级别的选举。第二,即便拥有公民身份,俄裔也普遍感到自己遭受歧视或被边缘化。一方面,俄裔在两国议会中代表性不足,无力抵挡本土保守政治;另一方面,“排俄”演变为全民对“历史正义”的追索。2007年,爱沙尼亚拆除苏军铜像,上万俄裔抗议,并与本土爱沙尼亚人冲突。爱沙尼亚的右翼极端势力甚至以法西斯历史为荣,认为纳粹党卫军“保家卫国”“抗击苏联”。^④ 这些政治操作普遍反映了国内排俄的态度。数据表明,85%的爱沙尼亚人认为苏军铜像与其民族认同无关;82%的爱沙尼亚人认为苏联是侵略者;71%的爱沙尼亚人认为俄罗斯正在入侵邻国。^⑤ 随着民族隔阂的滋生,出生在拉脱维亚的二代俄裔对拉脱维亚的归属感也出现弱化,从2004年的70%降低到2010年的30%。^⑥

(二) 文化边界上的语言和教育

语言是民族文化最核心的呈现形式,也是民族认同最显著的塑造力量。^⑦ 语言还是区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最关键的象征性边界。^⑧ 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俄裔突遭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原先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不在,成为所在国社会的次等人;^⑨ 另一方面,随着两国独立后将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在保守政党的推动下,俄语的使用不断严格受限,俄裔受到严重的文化歧视。^⑩

第一,公民权利方面。两国都采取严格的语言法规,在就业、福利、教育等社会领域设限,并以

① Jeff Diamant, “Ethnic Russians in Som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Feel a Close Connection to Russia”, 24 July 2017, PEW,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7/24/ethnic-russians-in-some-former-soviet-republics-feel-a-close-connection-to-russia/>

②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5.

③ David Newman,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 Worl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vol. 30, no. 2, pp. 143 – 161.

④ Rolf Michaelis, *Estonian in the Waffen-SS*, Atglen: Schiffer Publishing, 2009.

⑤ Aksel Kirch, Tarmo Tuisk, Hanna-Hulda Reinkort, “Estonian and Russians in Contemporary Estonia: Is the Soviet Past Still Dominating 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onferences, 2011.

⑥ Leva Birka, “Expressed Attachment to Russia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Young Russian Speakers in Latvia, 2004-2010”,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015.

⑦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⑧ David Newman,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 Worl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vol. 30, no. 2, pp. 143 – 161.

⑨ Irina Paert, “Memory of Socialism and the Orthodox Believers in Estonia”,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016, vol. 47, no. 4, pp. 497 – 512.

⑩ Ammon Cheskin, *Russian-Speakers in Post-Soviet Latvia: Discursive Identity Strategies*,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2016, pp. 71 – 73.

掌握主体民族语言的程度给予俄裔公民身份。相比于可使用两种官方语言的苏联时期,独立后两国的语言政策可谓大步倒退。第二,公共生活方面。两国都试图在公共生活中排除俄裔。如爱沙尼亚人中有71%的人反对将政府公文翻译成俄语。^①拉脱维亚2012年公投中有74.8%的人反对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即便俄裔拥有了客居国的公民身份,但俄裔的文化也不被客居国所认可。第三,教育方面。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均对俄裔学校采取限制,加大主体民族语言的比重,歧视俄裔教师。2004年拉脱维亚的“排俄”教育改革,有77%的拉脱维亚人支持,70%的俄裔反对,文化与教育层面的矛盾严峻。^②拉脱维亚文化部的声明指出:俄裔融合的基础是掌握拉脱维亚语言、对拉脱维亚国家的归属感、接受民主价值、尊重拉脱维亚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一致的社会记忆。^③对俄裔而言,这些举动是难以接受的文化灭绝。主体民族的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身份。

四、民粹浪潮下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排俄”的现状

在研判所在国的排斥俄裔的现状方面,有许多标准可以遵循,本文通过极端右翼政党的话语或政策来判断。在西方国家,政党选举是社会观念最外显的表现形式,选举结果及政党的政策输出能够表露一种在某个时刻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诉求或思潮。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民粹主义的兴起也与维护民族认同有关,反映了人们渴望建构一种独立的民族身份,从而排斥其他民族。

在拉脱维亚,民粹政党在转型后就迅速出现,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是“民族联盟(NA)”,该党是“祖国与自由党/民族独立运动(TB/LNNK)”和“一切为了拉脱维亚!(VL)”这两支极右政党的结合,也是该国民族主义政策的主要制造者,从2010年开始该党就保持在议会第四的位置,三次参与组阁。在爱沙尼亚,政党系统的稳定性相对更好,民粹政党并没有像拉脱维亚那样获得更大的政治机会,直到2015年,获得7个席位的极右翼“保守人民党(EKRE)”才引发国内的民粹地震。该党在2019年拿下19个席位,位居议会第三。两党在选举中都获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民意。但从现实来看,一方面,两党大体上虽都主张严格限制俄裔;可另一方面,相较于转型后激烈的反俄裔的历史,两党的立场又逐渐体现出两国弱化排俄的现状。

(一) 两党宏观上均稳站“排俄”的民族立场

第一,针对俄裔的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大做文章。2018年,在民族联盟的推动下,拉脱维亚又通过一项旨在限制俄语的法律。民族联盟成员艾萨尼克斯(Janis Iesalnieks)指出:“以色列从来不怕被称作犹太人国家,所以拉脱维亚也必须是拉脱维亚民族的。”^④保守人民党内部使用“寄生人渣(parasitical scum)”一词描述俄裔,在公民权上继续排斥俄裔。^⑤俄罗斯则多次指责保守人民党侵犯俄裔人权,称其为新法西斯政党。第二,敌视俄裔的祖籍国俄罗斯。考虑到对俄立场,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顺从(committed)、中立(open/neutral)和敌对(hostile),绝大部分右

① Inna Adamson, “The Russian Language in Estonia: between Politics and Pragmatism”,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vol. 7, no. 2, pp. 208–235.

② Carol Schmid, “Ethnicity and Language Tensions in Latvia”, *Language Policy*, 2008, vol. 7, pp. 3–19.

③ Leva Birka, “Expressed Attachment to Russia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Young Russian Speakers in Latvia, 2004–2010”,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2015.

④ Valery Engel, “Is the Latvian Government About to Settle the ‘Russian Issue’?”, 24 January 2019, Fair Observer, <https://www.fairobserver.com/region/europe/latvia-russian-language-law-europe-news-15241/>

⑤ Aliide Naylor, “Could Right-wing Populism Push Integrated Estonia Back Towards Russia?”, 22 May 2019, <https://www.euronews.com/2019/05/21/could-right-wing-populism-push-integrated-estonia-back-towards-russia>

翼民粹都属于前两类,但波罗的海地区的民粹政党多为第三种。^① 民族联盟在欧洲议会多次要求制裁俄罗斯,保守人民党党首马丁·赫尔墨(Martin Helme)认为俄罗斯利用并操纵欧洲的危机以服务于其复兴帝国事业,并称俄罗斯是“永远不可能与之伍的恶魔”^②。第三,两党间存在紧密跨国联系。由于针对俄族裔、俄罗斯等方面的敌视政策相似,民族联盟与保守人民党形成了紧密的跨国纽带。2013年8月28日,两党与立陶宛右翼民粹政党“国民与共和联盟(LTS)”签署鲍斯卡协议(Bauska Declaration),警惕国内的多元文化、全球主义与俄罗斯的野心。民族联盟的青年组织“全国青协(NAJO)”与保守人民党的青年组织“蓝色觉醒(Blue Awakening)”间也有密切的交流。作为波罗的海的民粹主义代表性力量,两党迎合主体民族完善民族国家身份的需求,总体上表达反俄立场。

(二) 两党的“排俄”随着欧洲多危机的发展而明显弱化

第一,在拉脱维亚。相比于前身“祖国与自由党/民族独立运动”和“一切为了拉脱维亚!”,当前民族联盟对俄裔的立场的激进程度有很大减弱。两支前身政党分别成立于1993年和2006年,都鲜明地反对俄裔与俄罗斯,以强烈的身份认同话术煽动拉脱维亚人,在语言上强调拉脱维亚语的绝对权威地位,同时主张限制俄裔“非公民”的归化,甚至在多场合使用纳粹标志。2011年两党联合组建民族联盟,虽然依旧反对俄裔,但其程度有明显的下降。一方面,民族联盟除了不满于俄裔与俄罗斯,在多危机时代更将矛头对准欧盟与新自由主义,增加了反精英与反建制的内涵,其反难民政策、反紧缩政策的言论更多。2014年参与组阁之后,掌握政权的民族联盟不断煽动穆斯林问题,俄裔得到相对宽松的环境,对拉脱维亚好感也随敌视的减弱和“反伊斯兰”的共同立场而提升。2015年有44%的俄裔对拉脱维亚有好感,在难民危机两年后的2017年升至59%。^③ 另一方面,相比于“祖国与自由党/民族独立运动”曾于1994年和1998年强硬推动限制俄裔公民身份的立法,民族联盟认可俄裔定居于拉脱维亚的事实,从而仅集中于限制俄语使用。^④ 第二,在爱沙尼亚。乌克兰危机以后,保守人民党鼓吹“俄罗斯入侵论”“俄裔威胁论”,声称俄罗斯在爱沙尼亚培植了5000名准军事化的俄裔青年,能够轻易瓦解爱沙尼亚。^⑤ 马丁·赫尔墨曾于2016年公开质疑总统候选人卡尤兰德(Marina Kaljurand)的俄裔背景,表示不认为俄罗斯人能成为爱沙尼亚总统。^⑥ 然而随着欧洲多危机深化,2016年后保守人民党对俄裔出现了明显的立场变化。一方面,难民危机后该国民族主义情绪高,俄裔也由于惧怕难民而将票投给“反伊”的保守人民党,民族立场温和且对俄友好的左翼“中间党(EK)”票数下降。数据表明,相比于爱沙尼亚人,俄裔对穆斯林难民更为抵触。^⑦ 由于有共同立场及较大规模的俄裔选民,保守人民党也开始宣称该党不能只是爱沙尼亚人

① Political Capital Institute, “The Russian Connection: the Spread of Pro-Russian Policies on the European Far-right”, 14 March 2014, https://www.riskandforecast.com/useruploads/files/pc_flash_report_russian_connection.pdf

② Louis Wierenga, “Russians, Refugees and Europeans: What Shapes the Discourse of the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 of Estoni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atvia*, 2017, vol. 25, no. 1, pp. 4–19.

③ “Poll: Ethnic Minorities Feeling Closer to Latvia, Express Limited Support on NATO”, 12 October 2017, <https://bnn-news.com/poll-ethnic-minorities-feeling-closer-to-latvia-express-limited-support-on-nato-172994>

④ Li Bennich-Björkman, Karl Magnus Johansson, “Explaining Moderation in Nationalism: Divergent Trajectories of National Conservative Parties in Estonia and Latvia”,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l. 10, no. 5, pp. 585–607.

⑤ Liis Velsker, “Mart Helme: Eestis on Ootel 5000 Noorest Vene Mehest Koosnev Riigivastane Kolonn”, 19 September 2016, www.postimees.ee/3842237/mart-helme-eestis-on-ootel-5000-noorest-vene-mehest-koosnev-riigivastane-kolonn

⑥ Rannar Raba, “Martin Helme: Marina Kaljuranna põhiprobleem on See, et ta on Venelane”, 14 April 2016, <http://sakala.postimees.ee/3655817/martin-helme-marina-kaljuranna-20-pohiprobleem-on-see-et-ta-on-venelane>

⑦ Jeremy W. Lamoreaux, “Acting Small in a Large State’s World: Russia and the Baltic States”, *European Security*, 2014, vol. 23, no. 4, pp. 565–582.

的,不反对俄裔加入,甚至以俄裔党员做样板。^①同时该党还主张与中间党合作,组建联合政府。这些都表明保守人民党“排俄”的弱化。另一方面,保守人民党开始对俄罗斯示好。如撤回对乌克兰人的免签政策,展现对俄友善;主张效法芬兰,实现对关系的正常化等。^②而俄罗斯也减少了对保守人民党的抨击,转向对保守人民党在反欧盟、反建制立场上的赞许。

五、俄罗斯对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政治捕获”策略

基于两国的议题需求和政党政治的差异,俄罗斯的政治捕获策略虽然遵循本文理论中指出的路径手段,但在实践策略上有所调整,具体分析如下。

(一) 俄罗斯对拉脱维亚的政治捕获:全方位的捕获策略

在拉脱维亚,由于公众对社会公平、司法公正、经济发展和反腐败等中左议题更为关切,因此俄罗斯采取拉拢左翼政党的策略,同时借该国政党选举波动性强的特征,与新兴右翼民粹小党发展关系,并煽动民众的反建制议题。拉脱维亚与俄罗斯于2007年就解决了边界问题,使拉脱维亚对俄罗斯和俄裔的民族矛盾化解了许多;同时该国自独立以来面临了比爱沙尼亚更高的转型阻力,无论是经济质量还是社会发展水平,及金融危机后复苏的能力都逊于爱沙尼亚。这些都使得中左的社会经济议题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左翼政党和新兴的呼吁提高工资、消除贫困、保障就业的政党往往有更好的表现,例如新保守党(JKP)、农民与绿党联盟(ZZS)、发展党(AP!)等。

第一,培植有潜力的左翼政党。拉脱维亚左翼和谐党拥有九成以上俄裔选民的支持,该党连续三届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谐党与统一俄罗斯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③俄罗斯通过培植和谐党中有影响力的政治高层或提供竞选支持来实现利益,如首都里加的市长乌萨科夫斯(Nils Ušakovs)就主张接受俄罗斯投资、扩大俄裔的公民权,并在诸多场合为俄罗斯发声等。俄罗斯也逐渐将和谐党从俄裔民族型政党引导为更具号召力的主流左翼党,使其在更广泛的拉脱维亚民众中具有代表性,为俄裔政治赢得合法性。^④通过培植左翼政党达到制衡民族主义,从而弱化“排俄”的目的。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曾在2002年选举中获得第二的左翼俄罗斯人联盟党由于始终坚持激进的民族策略,既丧失了俄裔选民的支持,又失去了俄罗斯的外部培植,从2010年开始连续四届未获任何席位。

第二,拉拢右翼民粹政党。拉脱维亚对俄裔族群的疑虑和歧视始终存在,右翼的民粹政党和本土政党多次联手,防止和谐党建立政府,但也有右翼政党与俄罗斯关系暧昧。前克格勃官员、现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伊特拉(Itera)总裁萨维基斯(Juris Savickis)就曾在选举中为政党“为了美好的拉脱维亚(AŠ)”提供财力支持,并且与斯雷瑟斯(Ainārs Šlesers)、斯克雷(Andris Šķēle)等颇具影响力的右翼政客建立关系。俄罗斯还影响在地方层面具有话语权的右翼政客,如文茨皮尔斯(Ventspils)市长伦贝格斯(Aivars Lembergs)等。^⑤2016年成立的右翼民粹政党“国家属于谁?(KPV LV)”在2018年选举中获得第二,引发了拉脱维亚的政治震荡。该党虽有反俄话语,但与民

^① Louis Wierenga, “Russians, Refugees and Europeans: What Shapes the Discourse of the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 of Estoni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atvia*, 2017, vol. 25, no. 1, pp. 4–19.

^② “EKRE Leader on Education, Russian Votes and Possible Coalition Partners”, 26 September 2018, <https://news.err.ee/864400/ekre-leader-on-education-russian-votes-and-possible-coalition-partners>

^③ 注:另外和谐党合作的俄罗斯政党伙伴还有“公正俄罗斯(CP)”等。

^④ Mike Winnerstig (ed.), *Tools of Destabilization: Russian Soft Power and Non-military Influe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Stockholm: Swedish Defense Research Agency, FOI, 2014.

^⑤ Agina Grigas, “Legacies, Coercion and Soft Power: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Briefing Paper*, Chatham House, August 2012.

族联盟相比并不起眼。一方面,受俄罗斯隐性干预,该党被称作和谐党的“影子分支(shadow branch)”,2018年大选后曾主张与和谐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在本土主义繁荣的拉脱维亚可谓离经叛道。^①另一方面,基于民众对本土精英长久的不满,该党在弱化民族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疑欧”“反腐”等反建制领域,为俄罗斯拓展地区利益提供机遇。该党对俄罗斯的立场处在相对开放的中间位置。如该党籍的议员戈布泽姆斯(Aldis Gobzems)所言,他们可与任何人合作,不存在政治红线。

第三,通过信息战煽动拉脱维亚民众反对北约与欧盟。2008年以前,俄罗斯频繁通过控诉拉脱维亚反人权、指责拉脱维亚为法西斯政权等方式直接表达对该国逐渐西向的不满,将俄裔作为舆论宣传的对象。多危机时代后,俄罗斯的宣传转向广泛的拉脱维亚民众,如散播拉脱维亚国家发展道路错误和政府能力不足的信息、削弱拉脱维亚媒体和政治环境对假信息的抵御能力、通过网络传播拉脱维亚统治精英与俄裔之间恶化的冲突、在选举前通过社交媒体扰乱政党竞争等。特别是对北约和欧盟的舆论攻击获得了越来越多拉脱维亚人的认同。一方面,俄罗斯夸大了北约为拉脱维亚带来的潜在威胁,如发布北约可能将核武器转移至拉脱维亚的新闻等,引发民众恐慌;另一方面,指责欧盟应为中东欧经济停滞负责、指责欧盟是美国的政治傀儡、批判欧盟移民政策的错误等,特别是穆斯林难民问题等。俄罗斯的信息宣传使拉脱维亚人和俄裔找到共同点,将对俄裔的不满转移给了治理能力不佳的本国精英、欧盟和北约等主流建制。

(二) 俄罗斯对爱沙尼亚的政治捕获:间接的捕获策略

爱沙尼亚稳定的选举政治为俄罗斯提供的机会不多,俄罗斯直接培植或拉拢政党的难度较高。同时爱沙尼亚人对俄罗斯舆论的抵御力强,数据调查表明,有81%的本土爱沙尼亚人愿意相信本国媒体的新闻报道。^②因此俄罗斯主要借由难民危机的背景,通过俄裔选民间接与右翼民粹政党建立关系,从而制衡右翼民粹政党对俄裔的攻击。爱沙尼亚的身份政治议题一直较为显著,右翼政党在选举中长期占有优势,右翼“改革党(ER)”连续四届位居议会首位,保守人民党的兴起更是体现了强势的民族主义浪潮。并且爱沙尼亚的选举体系一直较为稳定,选举门槛也较高,选民对主流左右两党的政治忠诚与对民主制度的认可度高,无论是新的右翼民粹政党还是小的俄裔民族政党都难成气候。^③

第一,从政党层面看。俄罗斯既无法直接笼络右翼民粹政党,也没有必要投资俄裔政党,如“爱沙尼亚俄裔党(VEE)”和“俄裔社民党(VSPE)”等最终都难以为继,并入其他政党。俄罗斯直接扶持左翼政党的策略在爱沙尼亚也最终宣告失败。成立于1991年的中间党起初并没有将俄裔放在重要位置,随着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商界与政界人士的影响,中间党于21世纪前后转向支持俄裔,并主张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俄罗斯也鼓励俄裔选民支持中间党,使该党选举份额从1992年的12.2%提升到2003年的25.4%。2004年,中间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建立合作关系,俄罗斯的影响不断加深,其中重要的一环是通过前总理、中间党前党主席萨维萨尔(Edgar Savisaar)实现的。萨维萨尔从俄罗斯得到大量竞选资金,作为回报,萨维萨尔在塔林等地为俄裔修建东正教堂、为俄罗斯文化中心建设提供支持、公开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并反对迁移苏联时期的纪念碑

^① “Russians, Populists on Top as Latvian Voters Seek ‘Fresh Faces’”, 4 October 2018,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81004-russians-populists-top-latvian-voters-seek-fresh-faces>

^② Külliki Seppel, “Meedia ja infoväli”, in: Kristina Kallas, Raivo Vetik, Jüri Kruusvall et al., (eds.), *Eesti ühiskonna loimumismonitooring* 2015, Balti Uuringute Instituut, 2015, pp. 87–97, <https://www.kul.ee/sites/kulminn/files/7peatykk.pdf>

^③ Daunis Auers, “Populism and Political Party Institutionalisation in the Three Baltic States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vol. 11, pp. 341–355.

等,中间党赢得了广泛的俄裔选民。俄罗斯通过培植左翼力量,使其在爱沙尼亚政治中的影响力迅速提升。2014 年后,乌克兰危机在爱沙尼亚民众间的恐惧效应使中间党逐渐疏远俄罗斯;2015 年,萨维萨尔受到贪腐指控,中间党也被指收受巨额来路不明的资金。为消除不良影响,中间党迅速选出新的党主席,采取更加倾向于西方的立场,不再过分强调其俄裔选民基础。此后,中间党采取一系列令俄裔感到背叛的政治操作,如与民族保守主义政党“祖国党(Isamaa)”合作,中间党从而丧失了俄裔选民的青睐。2019 年的民调显示,中间党在俄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从最高的 80% 降到 38%,最大票仓塔林仅有 16% 的市民支持中间党,原先为 35% (塔林俄裔人口占 34%)。^① 在政党制度稳定性强与选民忠诚度更高的爱沙尼亚,路线错误、丑闻或“背叛”将会使政党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难以翻身。爱沙尼亚左翼政党的失败使俄罗斯的政治捕获受到打击。

第二,从公众层面看。2015 年难民危机后,爱沙尼亚对移民问题的关切迅速攀升。2015 年 11 月,担忧移民的比例从前一年的 5% 升至 45%,目前仍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欧盟最大的威胁是外来移民。一方面,借助欧洲难民危机,保守人民党组织参与了多场反伊斯兰抗议,批判欧盟的开放边界和欢迎难民的政策,成为反建制策略的关键。^② 2016 年布鲁塞尔袭击后,保守人民党的民意支持度从 13% 升至 19%,越来越多人接受其极端主张。另一方面,反穆斯林移民是俄罗斯对俄裔的主要舆论方向,通过媒体、教会、市民团体等塑造俄裔的立场,制造他国内部政治紧张。自中间党逐渐失势后,俄裔选民就成为保守人民党希望拉拢的对象,最终在反难民政策与反欧盟建制的基础上,保守人民党和俄裔选民形成联盟,这一结合虽然令人诧异,但却是由双方的现实需要促成的。保守人民党停止了攻击俄裔,如曾强烈要求关闭俄裔学校,如今只说进行语言改革,但是改革也没有时间表,甚至在 2021 年地方选举之前保守人民党都没有触及俄裔问题,以寻求俄裔在选举中的支持。马丁·赫尔墨的父亲,前党主席、前驻俄大使与曾任内政部部长的马特·赫尔墨(Mart Helme)也逐渐放弃了俄罗斯恐惧症,直言波罗的海的和平与安全要依靠真诚良善的俄裔。^③ 他还质疑被视为民族认同第一枪的“歌唱革命”在爱沙尼亚独立中的积极作用,甚至将之贬低为“大众的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要求重新审视苏联历史与爱沙尼亚的对俄关系。基于反新自由主义的共同点,俄罗斯对保守人民党的兴趣也大增。在选举机制下,俄裔选票向保守人民党的流动为三方都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

六、结 语

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对俄裔的排斥是主体民族的意愿,其目的在于建立独立的国家人格与民族认同,民族冲突是两国独立后迅速出现的现象。^④ 正如学者指出的,两国始终有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缺乏自尊和自信,从苏联时期延续至今。^⑤ 从更广泛的中东欧来看,拉莫劳克斯(Jeremy

^① “‘Предает интересы своих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Как Центр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 Эстонии теряет сторонников”, 13 March 2019, https://baltnews.ee/tallinn_news/20190513/1017665870/predaet-interesty-svoih-izbirateley-kak-centristskaya-partiya-estonii-teryaet-storonnikov.html

^② Stefano Braghieri, Andrey Makarychev, “Redefining Europe: Russia and the 2015 Refugee Crisis”, *Geopolitics*, 2017, vol. 23, no. 4, pp. 823–848.

^③ Наталья Фролова, “Смена противника. Почему эстон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ы теперь борются не с русскими, а с ЕС”, 16 May 2019,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9132>

^④ Ravio Vetik,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Makeup of Estonia”, in: P. Kolstoe (ed.),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Post-Soviet Societies, The Cases of Estonia and Moldova*, Oxford: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 71.

^⑤ Brigita Zepa, Inese Supule, Evija Klave, et al., *Ethnopolitical Tension in Latvia: Looking for the Conflict Solution*, Riga: Baltic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2005, p. 48.

Lamoreaux) 总结道,俄裔在中东欧邻国被视为威胁的原因有二,一是威胁到主体民族的认同;二是受母国俄罗斯的庇护。^① 这两点为强调自主权和本土性的右翼民粹 – 民族主义政党提供炒作的资源。但当前时期,俄罗斯或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捕获”策略使邻国的右翼民粹政党逐渐弱化排俄攻势。这也是俄罗斯扩展地区影响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同胞政策还是“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政策,都表明俄罗斯已逐渐将海外俄裔视为其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一环,改善海外俄裔的身份地位、化解邻国民粹政治对俄裔的歧视必然也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方向,俄罗斯针对邻国内部政治的捕获策略起到了良好结果。基于俄罗斯的例证可以看出,通过各种手段提升本民族在客居国的地位,一来有助于缓和国家间关系、促进交往;二来有助于在全球民粹保守浪潮的艰难背景下实现国家利益,是外交中不可忽视的手段。

Abstract Due to historical grievances and real threats, the Russian Diaspora has been an obstacle for som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countries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ir transition, and seen more as a Trojan horse that would potentially divide the host country in the wake of the Ukraine crisis. Since the outbreak of refugee crisis, Russia has actively pursued an implicit diplomatic strategy of political capture to weaken the repulsion and attack on ethnic Russians by right-wing populist and nationalist parties in its CEE neighbors where conservatism is rife.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examine the role of this strategy in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ethnic Russians in these countries. This political capture strategy, targeting at neighboring countries, consists of three tactics: courting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cultivating mainstream center-left pro-Russian parties, and influencing voter preferences. These three tactics are validated b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tvia and Estonia, where rejection of ethnic Russians by populist parties used to be very strong, and now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Major issue demands of voters and differences in party systems in the host countries are decisive factors in Russia's choice of specific tactics. Solving the factual dilemma of ethnic exclusion of the Russian Diaspora in the populist-ridden CEE countries through multiple political capture tactic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Russia to realize its national and ethnic interests.

(彭泉,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黄凌翹]

^① Jeremy W. Lamoreaux, “Acting Small in a Large State's World: Russia and the Baltic States”, *European Security*, 2014, vol. 23, no. 4, pp. 565 – 582.